

潘俊杰◎著

秦汉学术转型与 中国佛、道教的兴起

兼论对当代文化建构的价值

 人民出版社

潘俊杰◎著

秦汉学术转型与 中国佛、道教的兴起

兼论对当代文化建构的价值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中联学林

责任校对:张明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汉学术转型与中国佛、道教的兴起:兼论对当代文化建构的价值 / 潘俊杰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

ISBN 978-7-01-016070-2

I. ①秦… II. ①潘… III. ①佛教—研究—中国—秦汉时代②道教—研究—
中国—秦汉时代 IV. 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8432 号

秦汉学术转型与中国佛、道教的兴起

QINHAN XUESHU ZHUANXING YU ZHONGGUO FO DAOJIAO DE XINGQI

——兼论对当代文化建构的价值

潘俊杰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天元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52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6070-2 定价:33.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自序

本书是笔者主持教育部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秦汉学术转型与中国佛、道教的兴起——兼论对当代文化建构的价值》的研究成果,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对此课题的研究,终于可以给国家和自己一个交代了。在成果付梓之前,笔者有许多感慨和思索,借此机会与读者诸君做一简单倾述,算是对几年来研究生活的一个小小总结。

本课题研究的缘起是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做博士后研究时,我跟从洪修平先生做中国古代儒释道三教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由于本人在博士阶段研究的先秦两汉时期的思想史,因此,中国早期“三教”关系很自然地就成为我新的兴趣点,洪修平先生也很支持我这方面的选题研究。课题很顺利地得到教育部的立项资助,对一个年轻学者而言是莫大的鼓舞。自此,课题的研究缓慢展开。中国早期“三教”关系的文献资料不是很多,大都集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更早时期的资料,比如说东汉或者西汉后期则少之又少,则只好求之于近些年考古发掘和海内外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2013年—2014年笔者有幸到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和牛津佛教研究中心去做访问学者,在这一年期间,通过与牛津大学的汉学家们探讨和对相关图书资料的收集,使我的视野和研究获得了很大的拓展。在国外期间没有了课时和高校日常事务的干扰,得以集中精力思考分析一些曾经长期困扰自己的学术问题,恍然顿悟之时总是让人欣喜不已。本文中的一些观点无论其学术价值有多大、是否有偏颇遗漏,大多都是笔者的一管之见,笔者愿意承担一切学术责任。虽也难免敝帚自珍,但依然热情欢迎诸位学者同仁和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曾经作为一名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年轻学者现已渐至中年，自感在读书与研究一途上吃苦、用功还不够勤奋，许多平时思索的学术新见解都草拟了写作计划和提纲，但在当代高校这个“象牙塔”里，在备课和上课之外还经常被塔里塔外的许多俗务所干扰，写作经常处于被打断和重新拾笔之间轮回的状态，思绪被打断对写作来说总会造成文章之意的断续。因此，这是笔者本书无法克服的一个先天的缺陷。请读者谅解！

此文是笔者主持教育部社科基金研究项目的成果，虽有20余万字集结成书，自感还不是很成熟，有些问题还需要做长期地研究和新成果的积累来继续加深。有鉴于此，笔者不敢奢望敦请任何前辈名家在出版之际给本文作序，一是文责自担，二是不想借助前辈名家之力沽名钓誉。一切皆以学术界同仁们公正的批评赐教为盼。

前言

19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世界出现了众多“新兴宗教”为代表的宗教复兴社会文化现象,至 20 世纪初期在民主和民族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大潮之中,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之下,佛教和道教的研究及其信仰在中国也再次复兴。“西风东渐”是当时的社会背景,救亡图存是那时的时代主题,传统学术的研究,包括中国传统宗教的研究不仅没有被西方文化的引进与研究所淹没,反而被作为救国立命的武器。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一大批“国学大师”和高僧大德在文化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虽历经文化浩劫,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政策虽历经曲折,但一路走来却愈益宽阔,宗教的研究亦是如此。佛教和道教信仰在西方的传播及西方对其开展研究,在 19 世纪之后逐渐兴盛起来,虽远远不及东方对西方文化宗教和科技的研究与借鉴,但“东学西渐”已成为世界文化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现象。随着中国、印度等东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进一步强大,以及西方“后工业文明”时代文化信仰危机对解决之道的向东方追寻,相信这一趋势将会不断强化。佛教和道教的信仰在改革开放之后 30 多年来的中国也日益兴盛,佛教和道教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早期佛教、道教的研究及其现实价值探讨,在海内外越来越受到关注。这是本文研究的重要背景之一。

秦汉王朝是中国社会历史又一巨变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及以“汉”为主体命名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都奠基于这个时期。从战国到秦汉是中国历史社会转型并走向成熟的转折,这个时期也使得先秦子学向汉代经学转型并进入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徐复观指出:“两汉思想,对先秦思想而言,实

系学术上的巨大演变。不仅千余年来,政治社会的格局,皆由两汉所奠定。所以严格地说,不了解两汉,便不能彻底了解近代。即就学术思想而言,以经学史学为中心,再加以文学做辅翼,亦无不由两汉树立其骨干,后人承其绪余,而略有发展。”^①这两个“转型”相辅相成,成为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典范。更加重要而且引起海内外研究兴趣的是,秦汉时期社会、文化双重转型的成果及其转型的末期(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本土道教也随之诞生兴起,不得不说与秦汉社会和文化的多重转型没有关系,准确地说,正是这个时期的多重转型及其转型成果的特质为佛、道两大宗教在两汉之际及其后的勃兴提供了文化的突破口和生长的土壤。这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学术考量。

当今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之下,文化全球化也在全球随着有形、无形的商品或人口的国际间流动而快速传播。虽然许多全球化的反对者声称,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只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在全球的泛滥,甚至只不过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模式及其观念的全球入侵和殖民;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甚至政治全球化已经成为人类在地球上发展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和未来持续发展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依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模式和文化发展的基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背后的实用主义哲学及其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所带来的对物质和金钱的崇拜摧毁了许多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堤坝,甚至早已摧垮了西方发达国家自己的精神家园。20世纪60、70年代欧美许多国家发生的信仰危机,以及当代出自于对物质主义的普遍不满、生存的焦虑或是对人生或人类发展各种困境的无解和失望,导致许多人试图回到他们童年时代的宗教,或是在人类童年时代就产生的古老宗教信仰和智慧里寻找世界与人生新的意义与法则,或是在新创立的一些宗教中或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极端团体中寄托和发泄激烈的情绪。如今在世界各地,正在从事寻求精神生活活动的人们数以千万计,这也正是宗教在21世纪初再次兴盛的主因。人类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证明,科学的发展并不能完全遏制宗教的发展,恰恰相反,在科技和文化昌明的社会,宗教生长的更加繁盛。目前,中国正处于“和平崛起”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

^①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自序》第2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的伟大复兴任重而道远,文化先行才能发挥对社会的先导作用,构建面向 21 世纪的新文化不仅需要借鉴人类文明、文化的优秀成果,而且更要注重对本身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借鉴。鲁迅先生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①这说明道教在传统中国文化思想学术中地位是多么地重要,也是探究许多历史现象、解决许多历史问题的关键因素。佛教和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体中的两大主体,对其在秦汉社会转型和文化思想学术的转型期内传入或兴起的研究,对于当前中国文化的建构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佛教传入中国并经过中国化而融入中国文化,道教兴起对中国自身传统文化和宗教的改造与创新,成功的历史经验以及佛教、道教的在竞争到融合过程中的教训,都为我们现在提供借鉴。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归宿。

秦汉社会奠定并开中国封建社会之端绪,实由春秋战国半奴隶半封建社会长期的激荡竞争而最后为历史所抉择,秦汉社会也实现由中国上古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剧烈社会转型;与之相随,中国上古学术的高峰——诸子学也慢慢过渡转变而为两汉经学,两汉经学又随着汉末社会向中古时期的过渡而进入类似漫长春秋战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汉经学向神学的转变直接为佛教的传入兴起和道教的诞生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和深厚社会基础与文化土壤。秦汉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成功实践,揭示出中国古代社会转型和文化思想学术的转型相伴而生、相互促进,在中国历史上各个社会转型时期均能发现文化转型与其相伴相生,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和深入变革既要同当代世界与时俱进,也要在继承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① 《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53 页。

目 录

Contents

自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秦汉社会转型:中国佛、道教兴起的社會基础	1
第一节 春秋战国“封国制”崩溃与郡县制的实践	/ 2
一、“封国制”的沿革	/ 2
二、“郡县制”的诞生与实践	/ 4
三、秦帝国对“郡县制”的发展与完善	/ 7
四、“封国制”与郡县制的历史比较	/ 9
第二节 西汉王朝“汉承秦制”及其政治实践	/ 11
一、西汉王朝双轨并行“一国两制”的改良	/ 11
二、秦汉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影响	/ 13
第三节 秦汉社会转型及社会机体的重构	/ 17
一、秦汉社会机体的重建	/ 17
二、秦汉社会生活风貌	/ 20
第二章 秦汉文化转型:中国佛、道教兴起的文化知识背景	28
第一节 先秦子学的成熟与没落	/ 28
一、先秦子学的融合	/ 28
二、先秦文化的“终结”与汉代学术的转型	/ 31

第二节 从子学到经学:秦汉文化“血脉”的浩劫与延续	/ 33
一、“焚书坑儒”文化浩劫与口耳相依的“传经”活动	/ 33
二、西汉帝国文化中心的形成	/ 34
第三节 汉代经学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	/ 39
一、儒家“经学”在汉代兴起的机遇与挑战	/ 39
二、汉代经学发展之阶段	/ 41
三、经学对“圣统”与“神统”的再建构	/ 43
第四节 从经学到玄学:文化宗教化的变革实践	/ 45
一、“经学”与“玄学”之关系	/ 45
二、“玄学”与佛、道教的引入	/ 47
 第三章 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下宗教神学体系的建构	49
第一节 先秦至秦汉神学发展的思想脉络	/ 49
一、春秋神学的动摇—战国“人学”的觉醒	/ 49
二、秦汉天道向“神学”的回归	/ 50
第二节 秦汉哲学的建构与本土原始宗教的兴盛:“性”与“天道”问题的重视	/ 53
一、秦汉时期是由阴阳五行的合流及其神秘化构成哲学和宗教发展的主线	/ 53
二、“性”与“天道”问题的重新探索	/ 59
三、秦汉帝国的法制与治国理论的选择	/ 67
第三节 经学哲学体系构建的发蒙及对宗教的影响	/ 73
一、“经学”与“讖纬”	/ 73
二、神仙,方术,巫覡之风的交杂	/ 75
 第四章 佛教传入、道教兴起与中国文化的重构	83
第一节 佛教传入、道教兴起的历史机遇	/ 84
一、两汉经学的理论缺陷	/ 84
二、两汉的社会氛围和主流思潮	/ 91

第二节 佛教传入和道教兴起于中国的历史考察	/ 94
一、佛教的世界化传播	/ 94
二、佛教传入中国考	/ 95
三、道教兴起考	/ 112
第三节 佛教发展及其中国化	/ 125
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地域、方式和途径	/ 125
二、佛教在东汉的传播	/ 129
三、佛教在魏晋与中国文化的交融	/ 134
第四节 道教的形成与发展	/ 136
一、道教的形成与传播	/ 136
二、道教对中国前期文化的整理与创新	/ 145
第五节 中国早期的儒佛道三教关系	/ 154
一、儒、道关系:排斥与妥协	/ 154
二、儒、佛关系:单纯的借鉴	/ 155
三、佛、道关系:斗争与融合	/ 160
四、“三教”关系在早期的综合演进	/ 164
第六节 佛、道教的兴起与中国文化的重新建构	/ 168
一、佛教平等思想、思辨哲学、精神心灵之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 168
二、道教医学养生学、道教精神修炼之学对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 172
三、儒学新建构对佛、道教的借鉴汲取与传统文化三大支柱的形成	/ 173
第五章 佛教传入与道教兴起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教训	179
第一节 佛教传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 179
一、佛教传播的“国际化”及其历史经验	/ 179
二、佛教传播的“本土化”及其历史经验	/ 181
第二节 道教兴起的神学化与非神学化	/ 182
一、道教兴起的神学化及其对传统宗教的改革	/ 182
二、道教兴起的非神学化及其对中国文明的推进	/ 183
第三节 中国文化的开放性与自适应创新	/ 184

一、中国文化应对佛教外来文化的历史经验	/ 184
二、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和自适应性的创新	/ 185
第四节 政治与宗教关系变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 186
一、宗教政策的变动对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 186
二、秦汉时期政治与宗教关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 187
 第六章 20 世纪以来佛、道教的复兴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189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佛教和道教的“复兴”	/ 190
一、“新文化运动”时期佛教的“复兴”与改革	/ 190
二、“新文化运动”时期道教的“续命”	/ 192
第二节 “佛教西行”和海外道教研究的兴起	/ 193
一、“佛教西行”的历史与现状	/ 193
二、海外道教传播的历史与现状	/ 196
第三节 “新宗教运动”的蓬勃发展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 198
一、“新宗教运动”的蓬勃发展	/ 198
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与中国当代文化的建构	/ 200
三、佛、道教的“复兴”对当代中国文化建构的价值	/ 205
第四节 冲击与回应:佛教外来文化与道教本土文化交融重构的 中国文化的历史经验在当代的启示	/ 211
一、佛教传入与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历史经验教训	/ 211
二、中国当代文化建构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自有文化	/ 216
三、中国佛、道教兴起的历史经验与当代社会	/ 226
 结 语	231
 参考文献	233

第一章 秦汉社会转型： 中国佛、道教兴起的社會基础

学术界关于“封建”一词到底应该包含哪些内涵和特征，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的讨论，观点纷纭，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中国古文里“封建”有分封建国的意思，这个“国”当然是诸侯国而非大一统的中央王国，例如：西周王朝“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究中国上古或者中古的历史显然很好划定历史分期；但是如果按照舶来品一词 Feudalism 来划分社会形态之用，则又容易与封邦建国的“封建”含义相混淆。因此，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封建”一词应该慎用，或者在讨论一个学术问题的时候提前予以界定说明。在本节中笔者为了避免术语本身没有统一的认知而带来理解的误差，弃用“封建”一词，而改用“封国制”来说明先秦两汉时期社会制度的变迁。先秦至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的社会转型变革时期，它在多个层面奠定了中国其后两千余年社会的基础，关于这一点已成学界定论，笔者亦避免在此讨论。秦汉时期不仅是中国社会巨变转型时期，在文化的角度也有一个大的转型和在总结先秦文化成就基础上的重新建构过程。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四年》，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20页。

第一节 春秋战国“封国制”崩溃与郡县制的实践

一、“封国制”的沿革

春秋战国的“封国制”本身与中国西周上古社会的血缘宗法制一根同生。西周建国之后，西周统治者分封了一大批有血缘关系的大小诸侯国，按照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其政治上的考量就是“蕃屏周”，说的直白点就是依靠有血缘关系的宗室贵族达到“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①西周晚期以至东周灭亡，也即中国历史分期的春秋战国时期，西周的封国制逐步走向瓦解，两千余年来关于上古的“封建”制度争论不休，历史上比较有代表的比如李斯、贾谊、柳宗元，近代以来章士钊、钱穆、徐复观等均有讨论的文章。李斯认为秦朝统一六合之后不应该再采用两周王朝的封国制，其理论观点就是分封同姓血亲为诸侯王必然走向“后属疏远”而为乱天下，这也是导致两周王朝分崩离析走向灭亡的主要原因，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讎，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②

李斯的论点很鲜明，西周以来建立的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封国制在制度构建上天生就有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亲属关系会一代代地疏远下去，最终血缘关系不仅不能凝聚王国而且会走向敌对的反面而从内部瓦解中央王朝。从社会普遍性现象来看这个见解无疑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

① 班固：《汉书·诸侯王表序》，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

国相互攻伐以至灭国，这些国家在最初时候的封君都是有着直接紧密的血缘关系的。西汉的贾谊分析了汉初异姓诸侯王和同姓宗藩反叛中央王朝的事件之后对于宗法封国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从人性的角度说：

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①

本来大秦帝国建立起完备的郡县制，西汉建国后“汉承秦制”，按照历史发展的惯性和必然趋势，郡县制应该是代表着更加文明的方向，但是由于秦帝国的快速灭亡，郡县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蒙上了历史的阴影。但是，封国制的弊端被历史一再地凸显出来，成为无法否认的现象。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认识封国制的弊端更有说服力。汉初的宗藩问题，历文、景、武三朝，基本上确是采取贾谊的构想解决的。^②历史上更为系统论述封国制问题的是唐代的柳宗元，其《封建论》一文对后世认识两周王朝崩溃有着深远的影响。

封建非圣人意也，……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而不暇。……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士，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列侯矫盈，黜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断可见也。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

① 班固：《汉书·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32-2237页。

② 管东贵：《封建制与汉初宗藩问题》，台北中研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1989年，第393-399页。

不使守宰是矣。……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或者又以殷、周圣王也（笔者注：殷、周皆实行封国制的“封建”），而不革其志，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①

柳宗元的从夏、商、周与秦政治之得失进行对比论证，得出的结论是夏、商、周的灭亡是制度的问题，不在于施政的优劣；而大秦的灭国是施政的问题而非制度不好。不好的制度在夏商周沿袭而不能革新是形势所迫，连圣人也无能为力。封国制的弊端远远大于郡县制。历史的发展必然会向郡县制发展。

二、“郡县制”的诞生与实践

一种制度的崩溃不会在短时间内被新的制度所取代，西周晚期（假设从公元前 770 年的平王东迁开始算）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全面的郡县制历经五百余年，在这期间，郡县制从萌芽到成熟后的全国性政体的确立也步履艰难而又漫长。郡县制最初是从“县制”开始，而且最早的变革也始于战国时期的秦国，秦国最终能够统一天下与其坚定地实行县制政治制度的改革不无关系。

根据学界考证，“县”的产生早于“郡”。最先设置“县”行政区域的是秦国。

武公十年（公元前 688 年）“伐邽（归，现甘肃天水）、冀（现甘肃甘谷县）戎，初县之”；^②

①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封建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43—48 页。

②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武公十一年(公元前687年)“初县杜(今陕西杜陵县)、郑(今陕西华县)”^①。

紧接秦国设置县制的是楚、晋等大国。

(公元前627年)晋襄公以先茅之县赏胥臣。^②

(公元前478年),子穀曰:楚文王“实县申、息”;^③

楚文王在位是公元前689—672年,晋襄公在位是公元前627—621年,楚国设县早于晋国。到了春秋晚期,设“县”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

(公元前598年)楚子“伐陈……县陈”;^④

(公元前597年)楚伐郑,郑伯对楚子曰:“使改事君,夷于县”(如果让郑国奉事君王,等同于楚国诸县);^⑤

(公元前594年)晋侯以瓜衍之县赏士伯;^⑥

(公元前585年),“败楚之二县”;^⑦

(公元前547年),“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⑧

(公元前539年),“晋之别县(把一县划分为二)不准州”;^⑨

(公元前537年)“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因其十家九县……,其余四十县”;^⑩

(公元前514年),晋吞灭祁氏、羊舌氏,“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⑪

关于“郡”的设置,根据文献记载秦国在公元前651年即春秋前期已置有

①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三十三年》,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③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哀公十七年》,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④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十一年》,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⑤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十二年》,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⑥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十五年》,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⑦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六年》,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⑧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六年》,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⑨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三年》,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⑩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五年》,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⑪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十八年》,中华书局1990年版。